

周恩来和泰国“儿童人质”

1956年8月19日，泰国政府的最高顾问乃汕在其总理奎披汶的支持下，通过绝密的渠道，将自己的儿女送到中国学习。此乃被周恩来总理戏称为中泰关系中的“人质外交”事件。

当时，美国政府反对泰国和中国发生联系。乃汕的女儿常媛记得：8岁那年，出国前夕，父亲带着她参加政府要员又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会。奎披汶总理把天真可爱的常媛抱在腿上，对她父亲说：“我们国家古时候常把统治者的孩子送到中国去，这是一种‘和亲’的表示。所以，我接受你的建议，以我的名义把你的孩子送到中国去学习，以此向周恩来总理表示我们要改善两国关系的真诚。没有哪一种信任要比这种骨肉之情更深厚！”乃汕当即决定派12岁的次子常怀去中国。常媛立刻嚷道：“不，让我也去中国！我是一个政治家的女儿！”奎披汶笑了起来，连称：“啊，小公主也担负起国之大任了！”

二战结束后，泰国在安全和经济上严重依赖美国，沦为

美国反共反华棋盘上的一个小走卒。然而，仰“美”鼻息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况且美国又在不断地削减对泰军援。泰国政府意识到一味盲从美国反共反华并非正道。恰好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，泰国外长万亲王同中国总理周恩来有了接触，并接受周赠送的中国丝绸等珍品。万亲王十分赞赏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，对周总理本人也深怀好感，并带着这样一个印象返回泰国：原来中国共产党人并非是美国人所描绘的那样青面獠牙。于是，他和奎披汶总理密商，决定由乃汕挑起秘密同中国建立联系的重担。首次尝试是通过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来建立同中国的联系。不料好事多磨，美国人获悉后，大为震怒，断然严加阻止。此计不成，又生一计。乃汕翻阅了中国的古书，发现中国人较重视“和亲”，便献策：不妨采用送“儿童人质”去中国的办法，以取信于中国。作为掩饰和平衡，他在送次子和女儿去中国学习的同时，又将其长子常曼送往美国学习。此举可谓用心良苦。

时值中秋，周总理决定接见已来华一些时日的泰国小兄妹。这天，天气格外晴朗。中南海碧波荡漾。当身着节日盛装的常怀和常媛在工作人员带领下，走进中南海，穿过花树绿荫，沿着树间的小路走上庄严、宏伟的西华厅的台阶

时，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已等候在门口。大家先是在西华厅前合影，而后进屋坐下。大厅里充满节日的气氛，茶几上摆满了水果和月饼。邓颖超让小兄妹先尝尝月饼。她说：“今天是中秋节，咱们这家人先过团圆节吧！”

懂事的小兄妹以泰国礼仪向周总理夫妇致谢，周总理夫妇也同样予以回礼。周总理亲切地问他们喜不喜欢中国。常怀笑笑不答，妹妹则一副可怜相地说：“周伯伯，我感到乏味。”确实，那时的北京灰蒙蒙的，仿佛是个小省城，甚至还达不到泰国偏僻小城的水准。小兄妹曾写了封信给父母，要求立刻回泰国。可是，中泰之间没有邮电联系，信未发出。于是，兄妹俩总是捣蛋。中文老师每次来上课，他们把她捉弄得掉眼泪，还故意写错字、念错字，把房间里的灯泡也打碎了。哥哥对妹妹说：“中国领导人看我们娇生惯养这么坏，一定会送我们回泰国的。”这一切，周总理都已得到汇报。他对小兄妹说：“我理解你们的感受。我在日本时，年龄比你们大，我也曾感到很乏味，语言也不通。所以，我劝你们要抓紧学好中文课，好吗？”

常媛点头答应，两只小手不由自主地竟把沙发垫花边拆了下来，折成一朵小荷花。这是妈妈在家教会她的。哥哥连忙用目光警示她要文静端坐，不可损坏主人家的沙

发，但已来不及了。周总理接过小荷花欣赏，高兴地说：“你们泰国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产品，看，这就是。”常媛说：“我的布娃娃用这朵小荷花打扮一定非常漂亮。”周总理关心地问：“你把布娃娃带来了吗？”常媛失望地摇摇头。周总理紧紧地搂着她：“不要紧，我们北京东四市场有许多漂亮的布娃娃，我派人带你们去买新的布娃娃。”时间过得真



快，不知不觉夕阳西下，当要告别西华厅时，周总理深情地说：“奎披汶总理和你们的父亲都是有远见的人，他们把你们俩托付给我，以了解中国和它的文明。这样，你们俩将来可干大事。”

小兄妹结束宾馆生活，迁入周总理批准花钱装修的新居。在那里，管理员、司机、警卫都会讲泰语。客厅里铺着

织有中国图案的又厚又大的地毯，卧室里放着俄式大铁床。他们被安排在北京第一中学读书，有专车来回接送。有一天，小兄妹正在学校小饭厅吃午饭，一个男同学怒气冲冲走过来对着哥哥呼叫：“打倒美帝国主义！”常怀气白了脸，立刻打电话要求离校回家。他对管理员抱怨：“你们要我和妹妹坐专车上学，又让我们受到中国同学的攻击，我怎么也不能忍受了！”很快，周总理知道此事，立刻同校长通了电话：“中国学生要学会尊重别人。常怀和常媛两位外国小朋友是我们的朋友，应更好地对待他们。”常怀再次要求不坐专车上学，周总理坚持不允许：“要是你们发生什么事的话，我怎么向奎披汶总理和你们父亲交代？你们远离父母来到中国，除了我们，还能靠谁？要听话啊！”于是，兄妹俩继续坐专车上学，同学们再也不说三道四了。

不久，小兄妹的妈妈来到中国。邓颖超把自己的高级轿车大红旗派来，供这位泰国政要夫人在北京逗留期间使用。星期天，周总理用泰国菜和中国菜设宴招待来宾。夫人热情感谢周总理对其子女的关怀照顾，说：“请周总理严格要求我的孩子。他们在家被宠坏了。要是他们在中国调皮、不听话，您可以打他们的屁股。”周总理朗声笑了：“像这样的孩子不需要打。突然改变生活

方式对他们是很困难的。我在日本时也是这样。只有假以时日，才能真正适应我们中国的环境。”忽然看到常怀掏出小笔记本正埋头认真记录他的话，便又对夫人说：“你的孩子很不错。他们一定会沿着父母的足迹前进。请您转告奎披汶总理，他挑选了两位优秀的代表来到中国！”

周总理日理万机，又常要出国访问，后来就把小兄妹托付给老资格的外交家廖承志照顾。1958年9月的一个晚上，也就是小兄妹在中国第三学年的开始，廖承志表情沉重地来到两个孩子身边告知：泰国发生军事政变，奎披汶政府被推翻，“你们的父亲被捕了”。震惊中的小兄妹心如乱麻，但哽咽中清楚地听到“廖爸爸”的话语：“根据周总理的指示，我们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保护你们，让你们在中国安定生活、学习、成长！”

当初乃汕献策送儿女到北京“和亲”时，原估计中泰两国将于一至两年内建交，届时小兄妹即可返泰。孰料世事多变，天不从人愿。乃汕被囚七年，出狱后曾来中国探望儿女。常怀在中国生活了10年，现为泰国上议员。常媛在中国生活了13年，后嫁给外籍人，现常年身居巴黎。她将其所生的两儿子分别起名为“念周”和“念廖”，以感恩和怀念中国一代伟人。

(摘自《宿迁晚报》)

汉唐明清四朝为何告密成风

“告密”，是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、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。“告密”是为社会上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，但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却如长了翅膀的瘟疫盛行于大地，摧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 and 心灵。

◆告密严重摧残人性

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“告密者”是崇侯虎，那是商纣王时代，距今约3100年。纣王任命西伯昌（即周文王姬昌）、九侯、鄂侯为三公。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，因为不喜淫乐，纣王就把她杀掉，把九侯也剁成肉泥。鄂侯争辩几句，也被做成肉干，西伯昌听到这个消息，偷偷叹息。崇侯虎知道后，告诉了纣王。崇侯虎能知道西伯昌背后叹息一事，可见他和西伯昌的关系也非同一般，但为了讨好纣王，竟干起了出卖朋友的事情。

商鞅变法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国力基础，他在李悝《法经》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，将“告奸”和“连坐”制度化、严密化。这一制度建立在“什伍”即里保户籍制基础之上，秦国从此变成了一个大军营、大集中营。这一举措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，仅在都城“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，于是太子犯法”，商鞅采取镇压、打击的方法，效果显著。害人到头终害己，商鞅最后被五马分尸、

满门抄斩。“告密”，尤其是亲属之间的相互“告奸”，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丧尽，人性受到严重的腐蚀，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成泡影。

◆“亲亲相隐”得到认可

随着儒家地位的确立，“父子相隐”的主张为后世接受，汉宣帝地节四年（前66年）颁布了“亲亲得相首匿”的诏令。

此后“亲亲相隐”原则被历代所遵循，其要点有三：一、亲属有罪相隐，不定罪或者减刑；二、告发应相隐的亲属有罪；三、两类罪行例外，一是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等重罪，因为这类罪或直接侵犯皇权，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。另一类是亲属互相伤害罪，因为如果不定罪，被告人失去自我保护权利，家族关系也难以维护。

东晋元帝时，卫展为晋王大理，他上书反对“考子正父死刑，或鞭父母问子所在”的作法。梁武帝三年八月，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，其子景慈出庭，作证其母有罪，法官虞僧虬表示：“案子之事，有隐无犯，直躬证父，仲尼为非。景慈素无防闲之道，死有明目之据，陷亲极刑，伤和损俗。……景慈宜加罪辟。”（《隋书·刑法志》）景慈被判流放交州。元至治二年，驸马许纳之

子苏拉告发说：“臣父谋叛，臣母私从。”英宗斥之曰：“人子事亲，有隐无犯。今有过不谏，乃复告奸！”下令杀掉苏拉（《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·元纪十九》）。

“亲亲相隐”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，但其他人，如乡里、朋友、同事、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。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放纵下，时而暗流涌动，时而浊浪拍天。自秦以后，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，倾家荡产、人亡族灭者数以千、万计。

◆中国告密最严重的四个王朝

中国的汉、唐、明、清是告密非常严重的时期。汉武帝时，由于穷兵黩武、骄奢淫逸，国库为之匮乏。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汉武帝颁布了“算缗”和“告缗”令，搜刮财富。“算缗”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，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金抽税一算（120钱）；手工业者每四千金抽税一算；非吏比者、三老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；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；五丈以上的船每条约征一算。个人财产必须先自报，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，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，此即“告缗”。凡揭发属实，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，并罚戍边一年，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

告发人，作为奖励。北宋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实行“手实法”，类似于“算缗”和“告缗”。但因弊端很多，仅实行一年便停止。

史称“则天革命”的武氏改朝换代，其完成和巩固的“杀手锏”之一便是“恐怖政策”——“起告密之刑，制罗织之狱，生人屏息，莫能自固”（《旧唐书·酷吏传上》）。垂拱二年（686年）三月，武则天采纳纳侯保宗的建议，设置“铜匭”，类似于现代的“举报箱”。并设立“理匭使”的官职，专门负责开启“铜匭”。武则天诏旨地方，凡有欲进京告密者，州县不得询问详情，告密者享受五品官的待遇，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，“虽耘夫莠子必亲延见，稟之客馆。敢稽若不送者，以所告罪之”（《新唐书·后妃传上》）。告密有功者加以封赏，四方告密者蜂拥而起，来京向“铜匭”投书者络绎不绝。

一般军民亦难幸免，据《朝野金载》，公元684年某日，十几个侍卫军在客店饮酒作乐，一个人开玩笑说：“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赏，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。”这个“庐陵王”就是已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。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走出，去向上司呈文告发，酒席还没散，羽林军已破门而入，把他们全部抓获，经审问属实，告发者授五品官衔，说那句话的人处斩，其余在场的人属于“知反不告”，一律处以

绞刑（《太平广记卷二六三·无赖一》）。

◆明朝锦衣卫

明燕王朱棣以“靖难”为名，抢了侄儿建文帝的天下，他将方孝儒的十族当着方孝儒的面逐个处死，把方孝儒千刀万剐，随后“悉指忠臣为奸党，甚者加族诛、掘冢，妻女发浣衣局、教坊司，亲党谪戍者至隆、万间犹勾伍不绝也。抗违者既尽杀戮，惧人窃议之，疾诽谤特甚”。山阳平民丁钰告密其乡亲出语诽谤，因此而获罪者达数十人，“法司迎上旨，言钰才可用，立命为刑科给事中”（《明史·刑法志二》），告密成为“晋身”的捷径。

朱棣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，鼓励官吏彼此告发，恢复朱元璋时已废罢的锦衣卫，并于永乐十八年（1477年）设立东厂，从此厂卫合势，特务横行，流氓政治成了那个时代的特色。据史载，朝野内外均以刺探臣民隐私为乐事，“以故事无大小，天子皆得闻之。家人米盐猥事，宫中或传为笑谈，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”。在天启朝魏忠贤专权时，有4人深夜饮酒于密室，一人喝得兴起，漫骂魏忠贤，另外3人吓得不敢出声，骂声未落，已有人冲入密室，立刻将4人押至魏忠贤所，“即磔骂者，而劳三人金。三人者魄丧不敢动”（《明史·刑法志

三》）。

◆清文字狱

满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华，为维持和巩固统治，在残酷镇压各地反抗的同时，大兴文字狱，在入关后的第五年（1648年）便发生毛重傅等仿刻《制艺序》案，其后愈演愈烈，仅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百余年里文字狱多达百起，从乾隆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则无年不有，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达10起之多。皇帝事务繁杂，绝无可能遍览天下诗书，所以“文字狱”大都由告发而起，如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的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，“当时是时，文字禁网严，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，遂逮下狱”（《清史稿·文苑传一》），两年后康熙下令将戴名世处斩，方孝标戮尸，是案牵连数百人。赵申乔身为都御史，疏参本为职责所在，但此事仍遭到指责，“申乔有清节，惟兴此狱获世讯云”，一世清誉毁于一旦。

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种：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，因而大义灭亲；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，为保护自身做出的选择；与被告者有私怨，借机报复；完全是利欲熏心。除第一种情形外，告密者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，最后落得众叛亲离、身败名裂。

(摘自《读者导报》)